

沈寂的眼睛,炯炯有神,尤其是他在口述历史、说到精彩处时,更会放射出异样的光彩。

那是在前年春天,我担任了沈寂先生口述历史的撰稿人。做口述史、写传记,最大的一个难题是口述者或传主,是否能做到不为尊者讳,不为自己讳。沈寂做到了,特别是在讲到自己成长过程中出的一些“洋相”时,实话实说,毫不隐讳,令我肃然起敬。

记得第一次访谈时,我问沈老,您一生能写出那么多的小说、电影剧本、人物传记等作品,一定和您的家庭教育有关吧?沈老听了却摇摇头说:“不是的,我的父亲是码头小工出身,是文盲;母亲也只是位家庭妇女。如果说有点影响的话,就是我小时候父母常带我去看戏,看电影。”说完,他笑了笑,眼睛里闪过一丝温柔。

我不甘心,又问他:“那么,您小时候上学时,作文一定写得很好吧?”沈老马上否定说:“不是的,不是的!我上小学时,最怕写作文。每次在课堂上写作文,总是开头先写上‘人生在世’四个字,再写上二三句话后,就无下文了。有一次,我几乎是交了白卷。几天后,老师上课时发作文本。按惯例,成绩最好的同学的作文本放在一叠作文本的最上面,而成绩最差的作文本放在最下面。老师从上到下按成绩优劣叫同学到讲台前领作文本。我自忖,自己肯定是最后一名,便耐心等待最后上去领作文本,并恭听老师的批评。未曾想到,老师拿起第一本作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意即世界上最难的是始终对父母和颜悦色。孔子精辟!仔细想想,这恰恰是我们最应当做到的。

据说,有个居民区开展“什么是幸福”的讨论,得到的答案竟有127种之多。很难说谁的回答是不正确的,但确又使人感到“幸福”内涵的不确定性。幸福一词在字典上的解释是指一个人的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长久的喜悦,并希望一直保持现状的心理情绪,是一种看不见的感受。仔细想来,这样的注释虽有“魏晋”之风,但观察生活并不尽然。有时候幸福就在我们身边,就是和颜悦色。

例如在春风轻拂的夜晚,我就特喜欢挽着爸妈一起在小区里散步。天上有稀疏的星汉和皎洁的月光,地上是浓密树影覆盖的小路,静谧得只听见我们仨的脚步声。这时刻,我常会产生一种幻觉,人生之路一直这样走下去该是多么的惬意。时常可以遇见和我们一样漫步的人:说着悄悄话的年轻人,低声说笑的三两邻居,挺胸健步的白发老翁,牵着孙儿的爷爷奶奶……微微侧目,便能看到他们幸福的神情。那一刻,我似有所悟。幸福,未必全是万贯家财、宝马雕鞍、前呼后拥,和颜悦色不也是一种很耐看的幸福吗?

在充满挑战和竞争的当今社会,很多人都沉浸在巨大的学习和工作压力之下,一切都仿佛始终处在进行时。学生不得不常常把没做完的作业带回家,父母不得不常常加班伏案夜战。因此,即使是简单的对家人保持和颜悦色,有时也成了一种奢侈。于是我会经常想,态度决定幸福,当我们学会了宽容,学会了从容,我们便得到了幸福。

清末民初之后,上海虽已成为全国新闻舆论的中心,报业已有较大发展,但报社的机构和运作大都还是手工业方式。以副刊为例,多数是主编一个人编一个人写,夜光杯也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之后副刊作为报社的一个部门,开始时名为组,后来改名为部,再后来机关化,干脆叫处、局了,夜光杯在唐大郎主持时人手增加,帮他组稿、组织版面和修改稿件的,像戏班子“硬里子老生”的老编辑就有了三四个,学徒式的也有二三个,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成材的不多。

笔名“闻乐”的陈振鹏是唐大郎之后的第二位“夜光杯诗人”。新中国成立前他参加地下党,早年与宋纫秋在京剧票房组织,又在上海京剧界研究剧目,调进晚报,人们才发现他的打油诗写得与唐大郎不相上下,而思想内容比唐大郎还强些。闻乐多才多艺,旧体诗词之外,还擅作元人小令。1962年前后,他为程十发的历史题材连环画《胆剑篇》画图,一一配上元曲作为解说词。这组画线条古朴,构图别致,前所

文本,叫出来的竟然是我的名字。我非常惊讶,心想我怎么会是第一名呢?我犹犹豫豫地走到讲台前,刚伸出手去接作文本,只听到老师说了一句,对不起,我把这叠作文本放倒了。你的作文成绩是最后一名,倒过来一放,就成了第一名了。老师的话音刚落,同学们立即哄堂大笑。我只得尴尬地回到课桌旁坐

沈寂的眼睛

葛昆元

下。”这时,我看到他的眼中依然流露出一种孩子般的羞涩。

这次出“洋相”对他的刺激很大,终身难忘。后来,他发奋努力了。但是他说,他能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主要是得到了柯灵的提升和指导。柯灵在收到他第一篇短篇小说后,写信给他,要他再连续写两篇小说寄给他。不久,柯灵就连续发表了他的这三篇小说。并亲自撰文向读者推荐青年作家沈寂。说到这里,沈老笑了,眼中满是感激之情。

前些年,我听说,沈老在抗战期间曾参加过新四军。但在沈老之前的一些回忆文章中,鲜有提及。有一次,我请沈老专门讲讲这段经历。沈老听了坦然地说,这也是他想重点讲的一段往事。

沈老说,当时自己太年轻,不懂革命道理。参加新四军的第一天,就出了“洋相”。那天,团部开欢迎会,老战士们都高唱抗日歌曲,自己听了热血沸腾。所以,当大家要他表演

看过一本翻译小说《质数的孤独》,作者是意大利80后作家,而且是个粒子物理学博士。物理学家跨界写小说,出手不凡,这本处女作小说一问世,就获得了意大利文学最高奖“斯特雷加奖”,令人啧啧称奇。小说写的是一对幼时受过心理创伤的青年男女,想彼此靠近,却无法触到对方心灵的故事。作者借用了数学中的一个概念,将这对青年男女比喻为一对“孿生的质数”。质数,只能被一和自身整除,而孿生的质数,几乎彼此相邻,中间却有一个偶数阻隔了它们的亲密接触,比如3和5、11和13,孤独因此成了它们挥之不去的宿命。在作家笔下,男女主人公就是这样一对孿生质数,孤独而失落,虽然接近,却无法走进对方的内心世界。弥漫在小说中的

节目时,他马上拿出口琴吹奏了一首外国歌曲《家,甜蜜的家》。满以为吹得很认真,很动听,战士们也鼓了掌。不料,第二天团长来对他说,你的口琴吹得不错,但在抗日部队里,不能吹奏《家,甜蜜的家》这样的歌曲,这会影响士气。沈老说,团长不说,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团长批评得有道理。

更大的“洋相”,是出在训练中。当年,沈老长得瘦小,手臂无力,每次投手榴弹,都没有超过五米。班长为他着急,朝他吼道:“你这样投弹,鬼子炸不到,自己倒先被炸死。”沈老说,班长是个好人。他吼归吼,但是打起仗来,却很关心他,总是让他和其他新兵先朝鬼子开枪,然后趴在地上不要动,班长则带领老战士们趁鬼子低头避子弹时,向鬼子冲去,展开肉搏!沈老感慨地对我说,这是班长有意保护他们这些新兵。几年前,沈老被授予“杰出电影艺术家”的称号后,曾有一位领导同志在看望他时称他是“革命者”。他却诚恳地说:“我算不上是革命者,至多是一个抗日的爱国青年。而我的班长可以算得上是一个革命者,因为他有崇高的信仰,是真英雄!”这时,我注意到沈老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崇敬的光芒。

其实,能坦然说出自己出过的“洋相”,这样的人也是真英雄!

昨天晚上19点55分,沈老仙逝。惊悉闻,我十分悲痛。回想旧事,相信沈老那双勇敢、智慧、炯炯有神的眼睛,犹如天上的星星将永远伴随着我们。

便是这样一种忧郁、孤独、纠结的氛围。

读罢小说,掩卷沉思,孤独可能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生存状态,是人走向成熟无法绕开的一段旅程,是完

舒伯特的孤独

刘蔚

整的人生必须付出的代价。古往今来,孤独也是文艺作品中一个永恒的主题。

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香奈尔与斯特拉文斯基》。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春之祭》巴黎首演惨败,乐史上有记载,电影一开始表现的就是这段20世纪初轰动世界乐坛的公案。至于他与时尚女王香奈尔的恋情,以前只是听说过,电影用艺术化的手法展现这对20世纪现代艺术风气之先的大师的情感传奇,自然离不开虚构。不



戒慎小时候也上过几年学,上学的最后一年班上调整了座位,戒慎有了一个新同桌。

对这个新同桌戒慎一点儿也不了解,因为老师一直是按同学们的身高去排座位的。前几年,又高又胖的新同桌一直坐在后排,而戒慎相对瘦小,位置因此比较靠前。可是这一年,戒慎的身高蹿得很快,所以,戒慎和新同桌才有机会坐在一起。

对于新同桌,戒慎知道的只有他父亲是退伍军人,因为有时候在课间,他会站在院子中间要几下他从父亲那里学来的功夫。

戒慎和新同桌的交流不多,因为同桌唯一的爱好就是睡觉,不管是什么课,只要一上课他就开始趴在桌上睡。

老师只有一位,可能是习惯了,也可能是因为同桌的成绩一直还不错,所以,老师基本是不管他的。

对于同桌睡觉戒慎也无所谓,但麻烦的是,每次他一睡着身体便会舒展开,慢慢地就把不大的桌子占满了。有时候睡出了状态,他还会挥动手臂,把戒慎的文具扫得到处都是。

戒慎起先一直忍着,到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便和同桌展开谈判,内容是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我们在桌上划了条线,规定没有特殊原因不得越界。考虑到同桌的体形,戒慎也做了必要的让步,划分给他的地盘要比留给自己的多。

同桌很合作,说了句没有问题,然后倒头便睡。



过,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影片中斯特拉文斯基孤独忧郁的眼神。《春之祭》失败后,痛苦、失望和孤独写满了他的眼睛,而香奈尔读懂了他的眼神。她理解他作为艺术创新付出的心血,以及世人的指责甚至诽谤所带给他的痛苦,于是向他伸出援手,请他全家住到自己的乡间别墅,专心创作,从惺惺相惜到坠入爱河,两个孤独的心灵写下了20世纪世界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

自然,艺术家的孤独与常人的还不太一样。为寻找新的艺术突破口却不得要领,达不到自己的艺术理想,遭人误解,无论付出多少努力依然默默无闻,标新立异、特立独行而在人群中形单影只,等等,这些都可能使艺术家陷入痛苦和孤独的深渊,但也可能成为他们愈挫愈奋、创作出传世精品的契机。可以这样说,真正有成就

没过多久,戒慎便发现,原来规则这种东西是给清醒的人制定的,对于那些不清醒的人是无用的,而戒慎的同桌几乎没有清醒的时候。

戒慎趁着下课埋怨了他几句,同桌老老实实地听着,也没有回嘴,反倒弄得戒慎不好意思说下去了。

过了几天,矛盾终于激化了,同桌睡觉的时候把桌上的一瓶墨汁扫到了前面,弄脏了前排女同学的衣服。女同学哭了一整天,同桌被老师好好地教训了一顿。

同桌受了气,无缘无故地和戒慎吵了一架,最后两人不再讲话。自那以后,同桌上课居然也不睡觉了,有时候扭头,无意间和戒慎的眼神碰在一起,两人迅速收起笑容,狠狠地对视着。

这样的冷战不记得持续了多久,戒慎只记得后来两人的关系缓和了一些,但谁也没有和对方说话。再后来,戒慎离开了学校,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了。

前段时间戒慎偶然在路上见到了当年的同桌,两人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聊了很久。比起当年,他反倒显得瘦了些。戒慎疑心自那次之后他缺少睡眠,所以身材便保持住了。说实话,和他遇见的时候戒慎连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而那些往事也是戒慎在记忆中拼凑了很久才回想起来的。

很多时候,等我们记起昨天的怨恨时,它可能已经是很可笑的事情了,可仍然有很多人放不下。



影叙往事

(中国画)

侯丹锋

的艺术家往往都是孤独的,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孤独,才能造就优秀的艺术。从许多艺术经典中,我们仿佛可以窥见艺术家们忍受孤独、品味孤独、战胜孤独的心路历程。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是一部人的意志和力量战胜黑暗与邪恶的命运的颂歌。贝多芬写作这部交响名著时,正经受着日益严重的耳聋的折磨和煎熬,他固然有着强大的意志力,发誓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但他内心的痛苦和孤独可以想见,毕竟,他也有正常人的七情六欲。于是,我们在《命运》的第三乐章中,听见了大提琴和低音提琴奏出的低沉抑郁的旋律,犹如作曲家孤独愤闷的内心独白。正是有了这样的铺垫,最后一个乐章中表现的从痛苦走向欢乐、从黑暗走向光明,最终达到辉煌的凯旋,才显得丰满、真实而感人。又如,舒伯特的《流浪者幻想曲》和声乐套曲《冬之旅》中,都有一个悒悒独行的流浪者形象,在秋风萧瑟的菩提树下,在清冷的河边,在乡村小

路的邮车上,在风雨交加的早晨,在空旷的旅店,流浪者在寻找,在忧伤,在叹息,在期盼,他孤独的身影某种程度上正是一生杰作无数,渴望幸福而不可得,最终贫困潦倒的舒伯特的写照。温和的舒伯特曾经斥责一批庸俗的“艺术家”：“你们称自己是艺术家?你们不过是吹号手和提琴手而已,你们只配如此!我才是艺术家,我才是!我,弗朗兹·舒伯特才是那位闻名遐迩、众人拥戴的艺术家!我才是那位写出伟大优美作品的人,而你们根本什么也不懂得欣赏!”“激愤的话语折射出的是一颗不见容于世俗的高傲孤独的心。

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舒伯特身前默默无闻、未获承认,是个孤独的流浪者。幸好后来舒曼、门德尔松发现了他的音乐作品的价值,并且不遗余力地推广,才让后人领略了他的音乐艺术无与伦比的美,使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从这一点上说,舒伯特又是幸运的,他并不孤独寂寞。

未有,当时报社内外多数读者喝倒彩,说看不懂,但识货的人还是有的。这个高雅的连环画连载渐渐为读者所接受,终于在全国连环画中获奖,而且一再重版,成为名画名作。四十年后,连环画领域又出了大家,夜光杯连载了贺友直的海派风俗画。

闻乐先生在退休前后对灯谜发生兴趣,自制多种灯谜,审定所有的谜语来稿。

与闻乐年龄相若的老编辑陈榕甫编夜光杯数十年。他是抗战时期《中国的空军》杂志编辑,曾与美国飞虎队一同生活,到晚报后他成了诗词格律语言专家兼文史专家,是报社有名的“活词典”,编辑部遇到疑问,只要去问他,他有问必答有求必应,说出何年何月何书何刊何人所作。晚报上的《成语探源》栏目的撰稿人吾三省就是他。

胡澄清是唐大郎的办小报朋友、老编者。业余票票成了小报作家,在夜光杯上写过多部连载小说。《小镜子》是小刀会起义史话,可称代表作。胡澄清人称阿胡,胡子倒是刮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他组织的版面是一座曲径通幽的大观园,亭台楼阁十分雅致,与张慧剑编的版面(有人说是恢弘大气、欧洲古典式)相比,各具特色。这样的版面大约已是“不合时宜”,可能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至于笔名秦绿枝的吴承惠先生,他是夜光杯他们那一代老人中的小老弟。他与吴祖光、唐大郎都是至交。他的《休息时的断想》《不拘小记》等个人专栏早已脍炙人口,在上海拥有大量粉丝。这种文章做法别人写不出来也学不像,犹如明代的公安桐城派小品文,今人也只能隔岸看看野眼了。

十日谈

“夜光杯”絮语

关心人、为人民办报的思想不是一个人一天形成的。明请读赵超构与巴金的故事。